

1811
DONG AN WEN SI ZI LIAO

东安文史资料



1811
88
112590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湖南省东安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2481/34

封面设计

苏盛洲

美工

左卫星

责任编辑

彭绍安 苏盛洲

审稿

唐如皎 周芳双

东安文史资料

目 录

1988年第一辑

(总第二辑)

东 安 史 料

- | | |
|-------------------|--------|
| 东安县沿革考 | (1) |
| 东安和平解放中的一次激烈战斗 | (7) |
| 回忆随军南下接管东安的史实 | (9) |
| 漫谈解放前东安的教育概况 | (12) |
| 耀祥中学史实概略 | (19) |
| 回顾东安县的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运动 | (31) |

东 安 人 物 史 料

- | | |
|------------------|--------|
| 东安县“农民运动”中的英烈小传: | |
| 胡继麟烈士传略 | (39) |
| 烈士浩气,流芳千古 | (41) |
| 东安“农运”的带头人——唐仲疑 | (44) |
| 东安近代史中的著名人物: | |
| 唐生智墓志铭 | (47) |
| 席宝田事略 | (50) |
| 唐仁廉(赖子)事略 | (54) |
| 蒋锄欧行状 | (58) |
| 宾敏陔(步程)行状 | (56) |
| 雷铸寰传略 | (60) |
| 雷发聿小传 | (62) |

莫先进小传	(63)
-------	--------

东安地下武装史料

王首道同志在东安横塘的一段革命史	(64)
关于“华南人民解放军祁、邵、衡边区纵队”东安战斗的回忆	(66)
回忆我在吕恒部队中的经历	(74)
关于“湘南民联”组建活动的回忆	(79)

东安社会生活史料

东安鸡	(87)
东安舜皇岩	(88)
东安渌埠头“石观音沉香庵”史话	(90)
广利桥史话	(92)
吴公塔古今	(93)
东安武术史略	(94)
东安县文化馆的馆舍史略	(95)
东安楠竹产销盛衰简史	(97)

东安县沿革考

清光绪《东安县志》称：“宋太宗雍熙元年（公元984年）升东安场为东安县。”我县用“东安”命名至今已有1004年的历史，其历史沿革概述如下：

夏、商、周时期。

据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永州府志》（以下称《府志》）记载：“自黄帝经理天下，画野分疆，虽南至熊雄，而永土犹在荒服之外。”后来帝位传至黄帝的曾孙帝喾时，始将全国划分为冀、兖、青、豫、荆、梁、雍、徐、扬等九州。当时的东安，属于九州中的荆州范围，是“教化”外的荒服之处。

春秋战国时，东安属于楚国的南境。

秦统一中国后，“废分封，建郡县”，东安属长沙郡。

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析长沙郡，置零陵郡”。据《湖南省志，地理志》中的《湖南省历代郡国州县考》中介绍：西汉零陵郡治在今广西全州县和兴安县的正中间，属全州地。东安当时只是交通驿站，地处泉陵侯国范围。而泉陵侯国亦属零陵郡所辖。清光绪《东安县志》（以下称：《县志》）称：“旧志云：汉立东安驿，对太守治城为东，以莫徭错杂，故欲其安也。”这说明了东安设立交通驿站和“东安”之名的命名缘由。同时，在东安设驿站也有必要，因为当时零陵郡治在全州，而东安驿址在今紫溪市的马铺塘一带，是东安、全州、邵阳和泉陵之间的交通要道。

东汉时零陵郡治由广西全州迁至泉陵（即今永州市），辖今湘桂边区地带。东安仍属零陵郡。

三国时荆州全境原为曹魏所管，“赤壁”大战后，荆州被吴、

蜀瓜分，零陵郡隶属于蜀。相传张飞取零陵时，曾在东安驻兵，故今东安县紫溪市有“孔明点将台”和“张飞跑马岭”的遗迹。

西晋惠帝永熙元年（公元290年），析泉陵北部。置应阳县，以应水命名（应水即今之芦洪江）。县治故址在今芦洪市镇的范围。东安置县由此开始。

东晋和南北朝、历时二百七十二年改朝换代，变化频繁。但没有影响到县治的变更。

隋文帝开皇九年，将应阳、祁阳、永昌并入零陵县，隶属于永州总管府。

唐高祖武德七年，（公元589年）立“芦洪戍”。戍址在今之芦洪市镇一带。因唐王朝吸取了隋王朝灭亡的教训，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为了实施对地方的控制，在一些重要的边防地方，增设“兵戍”驻守，以防民众起来造反。当时的东安，地处边陲，荒凉偏僻，《永州府志》载：“唐、宋犹以处谪迁，则其荒芜可知矣”。当时永州包括东安在内，为唐王朝边僻之地，京官常谪贬于此，唐朝著名的大文学家柳宗元被贬永州十年就是其例，又因东安的西南面，当时还有强大的不服唐王朝“归化”的少数民族，故设“芦洪戍”，以便镇守。

唐昭宗“光化元年（公元898年），马殷取永州，立东安场官。”为什么要置“东安场”呢？《县志》称：“五代置场，掌以巡官，有茶、盐、竹、木、坑、冶诸场，东安无茶盐五金大利，盖资其材木，以造舟筏，所谓东安场者，疑船场云。”

宋太宗雍熙元年（公元984年）将“东安场”升格为东安县。《府志》载：“宋雍熙初，析零陵县地、立东安县，隶永州。”配有文官三人，武官一人；文官有知县、县丞和主簿，武官即县尉。宋仁宗起，东安境内和邻近的少数民族常起义造反，官军屡次镇压无效，到宋哲宗时，对少数民族改镇压为“安抚，县内悉平”。

元朝时，将永州郡改为永州路，仍辖东安等县。县衙除保持宋所设的知县（元称县尹）、县丞、主簿、县尉外，增设曲史、教谕

二官。《县志》称：“天功二年，瑶寇侵县境，自后十余年，寇乱时起。”又云：“顺帝至正二十七年，洞寇李铁陷县、毁其城”。次年，李铁降，时元朝亦亡。

明太祖立国后，永州路改称永州府，隶属湖广行省。第二年就派吉岳到东安当知县，他到任察看，一片废圩，官房、私庐尽毁，县城居民避走山寨。他只好借住在附近的老百姓家里。吉岳在东安当了八年知县，办了三件事：第一是招集走散的居民，重新复业，并修建一些官舍，以便公职人员居住；第二是设“芦洪市安检司”，配巡检一名，官阶从九品。巡检配有皂隶二人，弓兵十八人，维持地方治安；第三：对县境里内溪洞的瑶胞进行残酷镇压。《县志》云：“洪武七年，平里溪里洞蛮瑶地四十余里，皆虚之”。

洪武二十五年，医官唐思诚向知县建议修筑县城，遂始筑县城，并初具规模。宪宗成化七年，巡抚吴琛，令巡道郁文博，多方筹措、内外砌以砖石，将城墙增修到一丈五尺高，设有四门：东、南、西门都建有城楼、城门夜闭日开。唯有北门城外常有虎豹行踪，故常不开。崇祯十二年，知县周命新又把城墙增高三尺，使县城日趋完整。

宣宗至明英宗时，少数民族屡次造反，为了缓和同少数民族的矛盾，宪宗成化十一年，朝廷采纳永州知府杨崇之策，实行“九等均瑶法”，全县境地稍安。

崇祯十六年张献忠率义军攻占衡州，明王朝封蕃在衡州的吉王、惠王和桂王逃至永州，巡按刘熙祥派中军官上庸领百余兵，护送“三王”间经东安入广西。张率师追至东安，攻破县城。知县陈道俊，举人唐德明被义军处死。张献忠回师攻占永明诸县，设官吏管理。不久，义军兵败，张献忠所设的官吏尽皆被戮。吴三桂引清兵入关，虽建立了清皇朝，但国内尚未统一，东安仍归南明桂王所管。

清顺治四年以前，东安属南明。总督何腾蛟，兵备副使严启恒驻兵白牙市一带。顺治四年，清兵南下，何、严等人奔走桂林，东

安归清，清派杨迫廷为第一任知县。第二年，何腾蛟复出，攻下永州府各县，东安仍归南明。顺治六年，何腾蛟在湘潭被清军袭杀，永州各县又归清，顺治九年，明桂王联合李定国复取衡、永，东安再度归明。顺治十年，清贝勒吞齐复取永州，派王知鸿为东安知县修复县城。顺治十二年，洪承畴带大兵进取桂、黔，洪视东安为前沿重地，命永州知府张道登督工加固县城，派参军李孟夏驻防东安。清王朝为了加强对乡村的控制，将东安县划为总铺、柳溪铺、端桥铺、石板铺、狮子铺、……等十八个铺进行统治。每铺设铺司一至三人，在军事上设立“东安汛”（“汛”，是清代的兵制，凡千总、把总、外委所统率的绿营兵，都称“汛”），驻兵七十名（乾隆二十二年增至一百三十人）分为十八个“塘”，与行政上的十八个“铺”，共驻一地，相互照应。清代的县衙机构较前扩大了，县官手下，配有库子、门子、皂隶、仵作、马快、民壮、斗级、轿夫与伞扇夫等共五十余人，岁支银六两，而知县每年俸银三十一两七钱，养廉银六百两，还有典史，专司刑事和民事，另设监狱三间，配有门子、皂隶、马夫、禁卒等共十四人。在文化方面设有书院和考棚，考棚比较大，有一千二百个席位，还有祭祀孔子的学宫（称文庙）。此外，还设有武庙、文昌阁、名宦祠、乡贤祠、忠义孝悌祠、节贤祠等，在宗教方面，设有社稷坛、厉坛、城隍庙和八蜡祠等，社会福利方面，设有养济院和育婴堂等。

清朝中叶，农民起义不断发生。据湖南省志《湖南省近百年大事记》记载，道光二十六年九月，王宗献在湘南一带传习天主教，是年芦洪市魏洪培（东安县志记为魏世培）等人迎宗献来到当地祖师殿传教，入教者数百人。以其风声败露，便决定起义，占据芦洪市，豪绅唐玉成率领本族丁壮来攻会众逃散，王宗献转移到邵阳文明铺。后被清兵捕杀。清咸丰五年，两广天地会起义，与湖南会党联合，攻破宜章、郴州、桂阳和东安等地。胡有禄与朱洪英、何贱苟带领会军于四月六日攻占东安，把总郑玉恩战死。生擒知县赖史正。后清军大举来攻，会军与清军激战，会军先后战死者达千余人，胡、

朱、何先后牺牲。咸丰九年三月，太平军石达开部攻东安。知县李右文率人固守七日，城破，李右文及把总马廷荣、训导吴肇封、典史蒋庆保、县丞唐磷和兵民千余人被处死。后清军来攻，太平军退出东安；同年九月，太平军又路过东安退往全州；第二年九月，重修县城、还未竣工，石达开部又攻东安，知县赵荣祺、训导肖凤熙被击毙。不久，太平军又退出东安。这几次战争，使东安蒙受巨大损失：不仅县城被焚，连芦洪戍也被焚。

清咸丰元年，清廷下令各地办乡团，叶兆兰招募乡勇，严格训练，成为劲旅，得到湖北巡抚胡林翼的赏识，檄叶兆兰募千人赴皖。组成“界字营”出外省参战。后来席宝田，就地招募千余人为一军，名叫“精毅营”，参加对太平军作战。在道州、桂阳和宜章一带打了胜仗后，巡抚檄席宝田再增募四千余人，开赴江西作战。席宝田累功升布政使，在攻陷太平军首都南京时，他将洪仁玕、黄文英、洪仁政等人捉住献功；同治六年，他复募“精毅营”万余人，分为二十营，开赴贵州，镇压苗民起义。他最后当上了贵州按察使、赏头品顶戴花翎、黄马褂、业经额巴图鲁、骑都尉世袭。他的部属唐仁廉（即唐赖子）任通永镇总兵，赏花翎、巴达朗阿巴图鲁；唐本有（即唐生智的祖父）累官至清军提督。当时“东安县志”列表有名的文官九十五名、武官九十一人，可谓盛极一时。

民国三年（1914年）湖南省废“府”、“厅”、“州”，全省改设四“道”，东安属衡阳道。民国二十七年，湖南省分为十个行政督察区，东安归第七行政督察区管辖。据民国廿年七月出版的《湖南各县调查笔记》一书记载：东安县行政区划为八个区，即城厢、三河、仁智、仁寿、恭安、南应、北应和三水区；区以下称为段，全县共有七十八段。民国三十年，撤销区、段，改为八个乡，即三水（今之花桥）、北应（伍家桥）、南应（芦洪市）、恭安（井头圩）、仁寿（白牙市）、仁智（石期市）、城区（紫溪市）和三河乡（大庙口）。乡以下设91个保、1536个甲。当时的县政府设有局、挨户团总局、财政局和警察所，各区设区事务公所和区教育委员会等。

撤区立乡后，各乡设乡公所。下设保、甲长，负责地方行政管理。1944年秋，日寇攻陷东安，人民处于水火之中（东安人民的抗战史实，详见本会1986年文史资料专辑）。1945秋，抗日战争胜利。1946年，东安县城由紫溪市迁到白牙市。解放战争时期，东安县民国政府除了残酷镇压、掠夺人民和抓兵派款之外，毫无建树，全县千疮百孔，民不聊生。

一九四九年十月廿一日，杨国庆、刘永清等“南下工作队”一百零六人，随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一二三师四一〇团进入东安县政府所在地白牙市，宣布东安和平解放。十月二十七日，国民党县长胡祥接到解放军的通知后，于二十八日从紫云山下来投降；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陈颂平亦来自首，办理移交手续。十月三十日正式宣告东安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中共东安县委也于当天成立。十月三十一日，全县建立了四个区的人民政府。

与此同时，解放军一二三师收编了“湘桂黔边区人民解放军易仲民部”六百余人，整编了“湘桂边区湘南人民民主联军第一纵队陈一凡部”七百余人，通过整编，留用二百零九人，改为地方武装，建立东安县大队；陈一凡任县大队长，下设三个连和一个通讯警卫排；四个区、分设四个区中队，配合地方干部，开展工作。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六日，召开东安县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杨国庆任县委书记，刘永清任县长）会上提出了剿匪、恢复和发展生产、征粮、支援前线等工作任务。全县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支前、剿匪、反霸、减租退押、民主建政、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合作化等一系列的社会改革，人民翻身作主人，全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民主改革任胜利完成之后，党和政府又领导全县人民努力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三十多年来，全县人民，经过坎坷曲折的道路，正在沿着社会主义伟大目标开拓前进。

（本稿清史以上部分由杨苏勤提供）

东安和平解放中的一次激烈战斗

东安县是和平解放的。当时东安县的军警宪特慑于解放大军南下的声势，未曾抵抗就俯首投诚。但是，东安在和平解放中也曾发生过一次激烈战斗。1949年，白崇禧在策划“衡宝”战争时就安排了一个军部驻扎于冷水滩。其中305师师部驻扎于芦洪市，其目的之一是千方百计搜捕唐生智将军；目的之二是阻止解放军进攻广西。他们对于后一个目的进行了两项准备：一方面大肆进行反动宣传，305师覃师长，在芦洪市大街戏台上扬言要把东安的巷子烧尽、石臼毁尽、粮食运尽，实行“坚壁清野”；另一方面，在芦洪市的石拱桥头设置障碍，布置火力，准备顽抗。

1949年农历七月中旬，“衡宝”战场上的白军溃败。305师情知不妙，便狠下毒手，在我县沙子铺附近抓走了唐生智将军的家属和“顾山长(顾畴)”，余部在芦洪市一带继续加紧做顽抗的准备。

1949年农历润七月十九日凌晨，突然冲锋号声四起，枪声震耳，火光冲天。人们早已明白：这是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与白军在石拱桥头上展开了激战。白军305师的一个营，凭借芦洪市石拱桥头的工事负隅顽抗。解放军从祁、邵方面奔驰而来的先头部队四百多人，见冲锋受阻，敌人如此顽抗，便分兵前进，涉水的涉水、冲锋的冲锋，从湘塘坝、王家桥和柑子园一带迂迴前进，步枪声、机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响彻云霄。战斗不到两个小时，敌人已处于三面包围之中，败局已定，不得不边打边退，狼狈逃命。当天，白军就被追击到端桥铺一带，再也无力顽抗了。

战斗结果：我人民解放军伤亡三人，其中机枪手梁志荣同志中弹阵亡，英勇的解放军战士李杰和同志与敌人拼刺肉搏时光荣牺牲了，另一名战士负了重伤。而敌人的伤亡却十多倍于我。被我军俘虏和投降者达四十余人。

（雷扶楚组织座谈、采访和整理）

我回忆随军南下到东安的简况

李 庆 余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后，全国形势发展很快，中共中央华北局从华北各个地区选调了大批干部，在两三个月期间内就组成了十多个南下工作团。同年三月，我们在唐山市集中学习了一个多月。四月二十一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解放军很快渡过了长江，挥戈南进，四月下旬南京解放。五月中旬，武汉解放，白崇禧退守湖南。1949年4月底，我们随军南下的目的地已初步确定，随即开始南下。5月份到河南新郑县花园寺村整休学习两个来月。当时主要学习毛主席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及党的路线方针，特别是党的城市工作政策，金明同志还向我们报告了湖南的基本情况、地下党的活动情况和国民党在湖南的统治情况以及程潜、陈明仁和唐生智准备接受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湖南的大致情况。

1949年7月1日，由冀东14分区和15分区（主要是河北省兴隆和建院学员）的73位同志，在河南新郑县花园寺村组建东安县党政领导班子及骨干队伍。

当时在河南新郑内定东安的领导班子是：陈羲任县委书记，后因陈羲另有任用，而改由杨国庆任县委书记。刘永清任县长、郁生任组织部长、肖诚任宣传部长（到长沙后，肖诚另有任用，调张德隆任宣传副部长）、高绪周任公安局长、东平任县政府秘书、小杨明任财粮科长、崔绍先任税务局长、马恩荣任贸易公司经理、李治全任一区区委书记、夏富贵任一区区长，高助民任二区区委书记、张绪芝任二区副区长，周爱华任三区区委书记，李连起任三区区长，大杨明任四区区委书记，张玉华任四区区长。

1949年8月中旬，我们从河南新郑出发，坐火车到鸡公山。因火车中断不通，我们只好步行进入武汉市。驻在一个天主教堂里，一边整休，一边等候长沙的和平解放。这时的四野123师410团，已经追歼敌人，打到了湘桂边境。

长沙和平解放后，大家非常高兴。九月初乘轮船从武汉出发，由武汉警备司令部的一个警备连护送我们向长沙进发。国民党桂系军阀不甘心失败，撤退时不但炸铁路毁桥梁，而且还派飞机轮番扫射。我们的轮船白天只能隐蔽，晚上行驶，直到9月14日凌晨五时才抵达长沙。当时住在商工学校和高等法院的一所“模范监狱”里。这时国民党的所谓“政治犯”已经放跑了。长沙还没有正式接管。人民解放军还驻在长沙市郊区。城市秩序还由程、陈部队负责维持。我们在长沙过了从北到南的第一个愉快的中秋节。我们到长沙后，干部队伍进行充实调整。把原定去兰山县的同志，调一部分来东安。这样东安的同志由73人增加到106人（均系兴隆丰润、建院学员），重新调整了领导班子。杨国庆任县委书记，刘永清任县长、郁生任组织部长、张德隆任宣传部副部长、高绪周任公安局长、董平任政府秘书、单荫博任县委秘书。

1949年10月3日，我们从长沙出发到达了衡阳市。衡阳的铁路湘江大桥被桂军炸毁。火车停开。此时不得不在衡阳驻扎、休整待命。10月下旬，我们从衡阳步行向东安前进。走到祁东洪桥时，派人跟洪桥车站负责人联系。他们服务态度很好，表示一定要支持我们尽快到达目的地，立即用火车头把我们运送到东安井头圩的神仙桥。为什么还不能直接到东安？因为当时神仙桥也被桂军炸断了，火车头只能开到井头圩为止。我们没有办法只得又下车步行，于1949年10月21日下午五点多钟沿铁路小道步行到了东安县城。

当时县城的人民兴高采烈，准备放鞭炮和敲锣打鼓欢迎，但我们没有从火车站进城，而是抄小路到了白牙市。第二天一看，当时的白牙市根本不象一个县城的样子。县城除了一个破旧的火车站和一条狭窄的公路外，其他什么也没有。居民住房包括机关和学校公

房简陋不堪，如同“古堡”，文化娱乐一无所有。人们的衣、食、住、行和日常生活用品都很落后。我们当时所接管的除了土地、人民、政权、破旧公房和办公桌凳以及残缺不全的文书档案之外，几乎再没有什么值得造册登记的东西了。正如伪县长胡祥写给人民政府第一任县长刘永清的“白皮书信”中所说的：旧政府是一个“入不敷出，破烂不堪”的包袱。所以，我们没有花多大的精力和时间去办接管手续，而是积极筹建新政权班子，开创新解放区各项崭新工作的局面。

漫谈解放前我县的教育概况

陈 上 进

解放前，东安县的教育事业是比较落后的。史实是：在清朝二百多年的科举考试中，全县仅有极少数人在乡试省试中考取举人。至于远赴北京参加会试与殿试成为进士者，则从未有过。过去，一般人总认为是“风水”不好，“文风”不盛，所以“科甲”艰难。其实，这完全是由于当时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与地理条件所造成的结果。

我虽年逾古稀，但出生时清室已亡，科举早废，关于解放前我县的教育情况，只能一部分得之于前辈的传闻，一部分则为亲身的经历。清代的学制，一般人读书的地方可分为官立与私设两种：官立的叫“书院”（在北京的叫“国子监”）。东安的书院，据我所知有“紫溪书院”和“澄江书院”。书院的负责人不叫院长，而是称为“山长”。“山长”，既是校长，又兼教师，要取得“举人”或“贡生”的人才能担任。凡来书院就读的多为富家子弟，也有少数人取得了秀才的学历。至于劳动人民的子弟，则只能就近读“私塾”。私塾的组成有两种形式：一是一人为“东家”，聘请一位教师（多为考不上秀才的“童生”）在家或在附近的寺庙内教书，左右邻舍的子弟可出一点钱到此附读，名为“搭馆”；二是众人集资请一位教师，这种私塾称为“蒙馆”。蒙馆是一种启蒙教育，学生初入私塾，名为“开蒙”。开始的读物一般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与“千字文”等。

在蒙馆读了一、二年后，认识了一定数量的汉字，便读“四书”。“四书”是《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的统称。其中由于《孟子》篇幅较长，加之当时教师每日只教读若干句，

对于文句的意义不予解释，所以当时有“孟子梦三年”的说法；又因《孟子》中有的篇章难读难背，便又说“《离婁》、《告子》，打烂帽子”。因为《离婁》与《告子》是《孟子》中两卷最晦涩难记的文言文，如果书背诵不出，老师便要用鞭子打学生的手掌或脑袋。学生便设法戴一顶厚帽子来保护头部，所以说“打烂帽子”。由此可见当年的小学生背诵这些书是比较困难的。过去有一首嘲讽蒙馆学生死记硬背的诗：“一阵乌鸦噪晚风，诸徒齐逞好喉咙，赵钱孙李周吴郑，天地玄黄宇宙洪”。这样，学生除识字外，知识难以增加，而且在身心上还受到严重的摧残。

当时学校的第二种形式，名叫“经馆”。所谓经馆，是读经书的馆所。当时，取得了秀才资格的人才能算一个合格的经馆教师。蒙馆与经馆的主要差别有三：一是蒙馆只教文句，不讲解，重背诵，旨在识字，经馆则要对所点读的书进行讲解，名为“开讲”；二是蒙馆不作文，顶多是学学对几个字的对子，而经馆要学习写“八股文”，所谓“八股文”是明、清时代科举的一种特定文体，规定一篇完整的文章分为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部分，合称为“八股”。全篇字数也有定额，最多为六百字，后来又渐增至七百多字。学生学习作文，是一部分一部分学习的。如教师出个题目（都出自《四书》《五经》），先学做“破题”，这名叫“开篇”，后再一股一股地学到“束股”，把文中八个部分都连缀起来成为整篇文章，名叫“完篇”。一个经馆学生要到“完篇”的以后才能到县城去应试（考“秀才”的初试），名叫“观场”，意思是熟悉一下考场，以便日后正式参加考试。经馆学生除了读《四书》（包括讲解、背诵正文与朱熹的注文）外，还要读《五经》，即《诗经》，《书经》、《易经》、《礼记》与《春秋》，（《春秋》只读三家解经之一的《左传》，所以又称之为《春秋左传》）。经馆与蒙馆第三个不同之处，是蒙馆学生为走读，经馆学生则为寄宿，集体煮饭，各自备菜，名叫背“坛子”。老师则自己备菜（由学生按月缴纳菜金），老师还可以带一个儿子